

GUOJIA YU JIAZHI JIEDU ZHONGGUO SHEHUI ZHUANXING

陈伯君 著

# 国家与价值 解读中国社会转型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十六大胜利闭幕，仅24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的基本建成，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标志着中国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和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时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从国家建设的层面上看，组成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件是执政党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而支撑国家机器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价值取向。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国家的经济走向、政治走向和文化走向。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得以长期巩固，是基于维护这个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社会价值体系相当完善和公民对这个价值体系的普遍认同与遵循。而一种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动摇，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形成，也是基于旧的价值取向出现动摇，新的价值取向开始形成。因而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价值取向转型的过程。24年的社会变革，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

成都时代出版社

■ 陈伯君 著

# 国家与价值

## 解读中国社会转型

成都时代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与价值：解读中国社会转型 / 陈伯君著. —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

ISBN 7-80548-857-6

I. 国... II. 陈... III. 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价值（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D648.3②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3779号

责任编辑：郭 宏

封面设计：雅 涛

版本设计：雅 涛

责任校对：张大平

国家与价值：解读中国社会转型  
陈伯君 著

---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编：610017）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锦祝印务所印刷

787mm×1092mm 16开 21.5印张 420千字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7-80548-857-6 / D.1 定价：30.00元

---

电话：(028)86619530(综合类) 86613762(棋牌类) 86615250(发行部)



作者在重庆渝西学院(原重庆师专)寓所(1988年)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段话，大意是：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其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能够说，“已经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就无怨无悔了。30年前读到的这段话，今天想起来，倍感亲切，更受鼓舞。歌德说过：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绿。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时间局限。我不幻想收进这部文集的思考对今天的读者会有多大的启迪，相反，它淘汰得越快，表明社会发展的速度越快。未来的路正长，但愿能够继续保持对社会发展的忠实记录和思考。

## 序

# 见证改革

## 段 渝

《中华文化论坛》执行主编,研究员,  
四川省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

百年中国,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全面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改革的序幕,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胜利闭幕,短短的24年间,中国又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中华民族步入伟大复兴的崭新时期。

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性质上也是一场革命。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看,我们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要触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将引起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工作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改革,意味着社会转型,必然引发社会价值观的大转向、大突破。改革以来,我国理论界对社会转型问题一向寄予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大批学者积极投身其中,并发表各类精辟见解。但从国家与价值的视角出发,分析研究社会转型所造成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价值取向如何突破传统观念,进而探讨国家体制如何创新的学者,并不多见。

陈伯君长期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转型-价值取向-国家体制建设的实践与理论层面上,写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见证了20世纪末叶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变化,以及作者对这些变化所作的深入的理论思考,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一读。

我与陈伯君是同龄人,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爱好和十多年的交情,彼此了解较深。收进这本文集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后就读过,其研究动机和写作意图当时就有所了解。如今汇编成册出版,我有责任说几句,以加深读者的理解。

鲜明的党性意识和社会主流意识与突出的原创意识相统一,是他思考和研究社会转型的特色。什么是知识分子?近20年来有过几次大的讨论,众说纷纭,但有一点

是共通的:保持独立的政治见解。陈伯君不这样认识。他常说: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发展态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最根本的发展态势;人类文明已经进入政党时代,各个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利益与愿望,都集中体现在执政党的意志上;认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不认真研究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即使有独到的见解,又有何用?“保持独立的政治见解”等相关见解完全有可能与政党时代格格不入,故再“高明”也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我有同感,同时认为国家倡导“百家争鸣”,只要有利于社会进步,知识分子从各个角度切入社会都可以。我尊重每一种选择。陈伯君自觉地把理论研究纳入执政党执政兴国的范畴,是他的选择。他的理论文章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党性意识。他维护党的威信,相信党和国家的智慧与力量,力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新事物、新的发展。那篇《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可以看成是这一指导思想影响下的代表作。

对于“社会主流意识”,陈伯君的认识是“社会主流意识”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要素:国家意志、大众意愿和发展方向。国家意志是“社会主流意识”的核心,大众意愿是“社会主流意识”的基础,发展方向是“社会主流意识”的流向。搞理论研究,特别是研究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必须把握住“社会主流意识”,必须自觉地与“社会主流意识”融为一体。可见,他研究和思考社会转型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他绝不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游离于“社会主流意识”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热点很多,理论交锋激烈,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分配、公平与效率、自由与民主政治等等,他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都与“社会主流意识”合拍。

原创是理论的生命。一个搞理论研究的人,没有原创思想,就等于没有生命。原创思想很有可能是不成熟的。但理论的发展总是以无数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原创思想的积累为基础的。原创思想说出来后往往很简单,但众多搞理论的人都没发现或没去阐述,正说明对这些简单的原创思想的发现和表达需要才识和勇气。陈伯君知识面广,社会阅历丰富,这一点,《中国青年报》早就有过报道(《卓识基于博学——青年理论家陈伯君印象》,见该报1991年6月15日第3版)。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他提出史诗精神是社会主义悲剧艺术形态(1984年)、中国老一代工人“伟大”意识的失落(1986年)、社会无意识与气功大师们“妖言惑众”(199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与诚信要求(1992年)、农民增收的极限与国民待遇(1993年)、建立特价市场(1994年)以及价值的负增长同资本参与分配的法理原则(2002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2003年)等观点,都带有原创的成分。

改革还在进行,时代需要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又提供了环境和条件宽松的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成,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性的一步。只有当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完成之后,中国社会转型才算尘埃落定,新的价值取向才能定型。我衷心希望到那个时候能够看到陈伯君有更加成熟、更加全面的论著问世!

## 自序

# 社会转型的零距离接触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十六大胜利闭幕,仅24年,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的基本建成,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标志着中国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和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时期。十六大报告高度评价了这一社会转型,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划出三个时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为中期。之前,是思想解放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这个时期的历史性贡献,是在全党形成了“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还很长”的共识。这为我们党果断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石和思想基石,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多种途径并最终确立市场经济走向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和思想保障。之后,是政治体制改革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基本建成,基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设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即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时代最突出的主题。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是执政党的建设。建成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取决于执政党对自身的认识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贡献是我们党形成了“三个代表”的党建思想,使全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有了质的飞跃。十六大报告把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执政党的建设和执政兴国的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建设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实现途径。

从国家建设的层面上看,组成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件是执政党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而支撑国家机器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价值取向。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不仅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行为,也决定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政治走向和文化走向。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得以长期巩固,是基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完善和公民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普遍认同与遵循。而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动摇,新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形成,也是基于传统的价值取向出现动摇,新的价值取向开始形成。因而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价值取向转型的过程。24年的社会变革,我认为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收进这部集子的论文,是我20年来对社会变革引起价值变化的观察与思考。故而我在这部文集取名《国家与价值:解读中国社会转型》。它不是对中国社会转型作系统的、全方位的历史剖析和理论阐述,而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现象的有感而发,真实地记录下了我在特定时期的思想认识。故此,我把它们视为自己对社会转型零距离接触而闪出的思想火花。

一个人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历史给他提供的思想素材,还受制于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经历是他认识社会的切入点。我知道自己微不足道,没有丰富的知识准备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没有较高的视点和较宽的视野,不可能有好大的建树,但我尽力而为了。

我对社会转型的零距离接触是从农村开始的——那年18岁,高中毕业的第二天就办完了下乡当知青的全部手续。我怀着很虔诚的心情“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与队上的强劳动力们一道摸爬滚打,重活、苦活、脏活从不回避,赢得了贫下中农好感和怜爱。老妈妈们常常在我的饭里蒸一个鸡蛋。我对同桌吃饭面黄肌瘦的兄弟姊妹们深怀歉疚。在那个没完没了地铲除“资本主义之苗”的岁月,农民的日子每况愈下,我深知一个鸡蛋的分量。大寨的经验是:围剿资本主义,必须“杀心很大,下手很绝,批得那些搞资本主义的人心惊肉跳,杀得资本主义走投无路”。当时对农村“资本主义”的猛批猛杀,不过是“堂吉珂德”精神,具体说来,所谓搞“资本主义”,仅仅是农民想多养几只鸡,多卖几个蛋。在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的情况下,要求农村走大寨之路,把农村建成“抵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堡垒”,把农民教育成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需求的“社会主义新人”,国家推行的价值取向与现实需要不是相差太远的吗?事非经过不知难,事非经过不知对。成长在改革开放时

代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一个鸡蛋足以使世界观发生变化。我对在如此艰难困苦中生活依然保持敦厚博爱等传统美德的农民深怀感激和敬意,由此产生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我之后长期关注农民问题。我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乐兮?忧兮?中国农村潮》就是研究中国“三农”问题,与那段时间的生活和一直牵挂农民、农村、农业的历史情结有关。我在该书《后记》里写道:“我们都与中国农民有着斩不断的血缘的牵连。因其如此,近20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民经历了折腾又经历了振兴的命运,中国农民身上散发出来的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品性,行动起来少有顾虑的首创精神,移山填海的伟力,特别是破灭了再编织的永不息止的图强致富梦,都铭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抑或是一脉相承的血缘使然,抑或是念了几年书,忝入知识分子之列,染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笑而不自量的中国知识分子病,促使我们拿起分量并不轻的笔,记下今日农村终于圆成了的富强梦,也记下那些‘春风不度玉门关’依然贫困的角落,记下中国农民的伟大与局限、困惑与渴望,让作为个体的农民看到今日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但愿中国农民的日子更富裕,步子更矫健。”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考入西南师大,已经20岁。那时的大学生来自工、农、商、学、兵、政、党,汇集一堂就是社会的缩影。他们大都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成熟的思想,介入社会的热情很浓。这个群体,对课堂讲授的内容几乎都早就接触过、研究过,因而有大量的时间关注社会变革和带着问题进图书馆钻研。那时的大学生很少考虑自己的得失荣辱,自觉担起的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因而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我显得有点早熟,从不介入群体性活动。身在其中的我不是不受感染,不是缺少激情。我可以扪心无愧地说自己迄今保持着当年大学生的那些优点。我从农村走来,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充满憧憬,很清楚“稳定”和“躁动”意味着什么。大学生活来之不易,非常珍惜读书时光,非常看重稳定。在稳定的前提下解决问题,成为我做人做事所遵循的准则,它一直贯穿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研究和表达。我被激情澎湃的同学视为保守、不时髦。但我坦然。小时候,兄弟姐妹难免冲撞。祖母举起她的小竹条,呵斥:再闹,有理三千,无理八百。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无理取闹固然不对,有理取闹更不对——因为有理取闹者总爱不依不饶,即仗“理”欺人,把一个家庭闹得天翻地覆,断然不顾及自己的“理”是否真的成立,不顾及这个“理”与大局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有介入社会政治的秉性,“位卑不敢忘忧国”;没有这一秉性,中国历史发展还会更缓慢。但似乎任何秉性都有负面影响。如果缺乏政治家的襟怀(大局意识)和远见(发展意识),又自以为真理在握,固执己见,难免偏激,夸大理由的真理性,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其言行往往与社会主流意识相左,于社会进步无补,甚至成为社会的“噪音”,干扰社会有序发展。我想:既然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就得承认社会的发展与自然万物生长一样,有自生自长的内在动力。人为的作用必须把握一个度,必须

适可而止;超过这个度,结果揠苗助长,适得其反。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时机,需要条件;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再紧迫的问题,也难解决。何况,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去解决。这就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比如,腐败现象,败坏了执政党的声誉,锈蚀了国家肌体,危及社会安定,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谁不想尽快解决?但是,腐败是人的利己性在作祟,只要人的利己性还存在,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它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与社会制度关系不大,是世界性问题。它昨天存在,今天存在,明天还会存在。这便决定了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和长期性。法律制裁是该严厉,监管机制是该健全,打击力度是该加强,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何况,社会并不会因为有了严明的刑法,有了健全有力的执法系统,就能彻底消除腐败犯罪现象。又比如,中国需要市场经济,需要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难道只有改变国家性质,搞私有化一条路吗?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召开的13年,中国知识分子显得成熟多了。他们既保持了积极介入社会改革的秉性,又平心静气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就事论事,不再以偏概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许多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都受到重视并逐一解决了吗?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人口众多,矛盾错综复杂,意气用事万万不可。要相信国家的力量。因此,如果说,保持一点历史的连贯性,解决问题着眼于稳定,着眼于社会的承受力,这是“保守”的话,我想,那还是“保守”一点好。

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国情国力领域,偏重国情,属于社会学。国情是过去的延续,又是未来的起点。这就需要一点历史感。想问题、议对策、干事情,不从国情出发,必然误事误国。1957年从中国农村刮起的“共产风”,背离国情太远,后果极其严重。薄一波回顾说:“‘共产风’不仅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而且严重增加了群众对共产主义的误解,毁了一批干部和基层组织。一些坏分子则混水摸鱼,胡作非为,欺压群众,败坏党的声誉。因此,‘共产风’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6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一切从国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精神。而要有一点历史感,就得有发展观念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国情绝不会老是停留在我们曾经认识和把握的位置上。特别是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国情变化会很快。固守昨天的“真理”,难免刻舟求剑。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解决理论认识和参与社会实践需要遵循的原则。中国已经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面对新的历史性突破和崭新局面,如果不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建树,甚至被现实抛弃。

这部文集由三大内容组成:文学的社会批评、经济文化社会热点现象的剖析和政治理论创新的思考。它们分别代表我走过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与我的人生经

历相关,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热点同步。第一个阶段是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对社会思潮的批评。这不仅因为我学中文出身,毕业后讲授文学理论,之后又在四川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从事专职文学批评。更重要的是,正如任何时期伟大的社会变革都是文学做先驱,新时期之初,文学是社会的亮点。那时的文学不把艺术性、审美性看得太重。那时的文学是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起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促进改革的时代重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人道主义文学”相继出现,反映了社会思潮的流向。我在文学批评中,坚持文学要表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坚持文学要顺应社会主流意识,支持主流意识,凭借主流意识的力量,以建设者的姿态正面介入社会改革,塑造崇高的、坚强有力的艺术形象;坚持文学的人文关怀,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倡导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和奋发有为进取精神。我在许多文章里陈述了这么一些观点:“人的意识的超前性本质,决定了在人类的历史航程中有无数超越现实的理想之光为自己导航。这是人的伟大,也是人的悲哀。因此人类将在永远也实现不完的理想之路上披荆斩棘,被不断的失败所困扰。既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之圈,也就无须避免,把眼光从终点收回到过程中,抓住每一次历史性瞬间。这是人的悲哀,也是人的伟大。崇高在失败的悲剧情绪里酿成,像刘巧珍那样确保主体独立性而纵身一跃,落点是悲剧,却在命运之圈里划出一道最耀眼的蓝光。只有体验了失败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只有升华了失败的人生才是伟大的人生。”(《圆圈的价值》)“杜勃罗留波夫有句名言,伟大的文学在于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再补充一句就更完善了:伟大的文学还在于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所以,一位具有人民性的作家,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眼光必须适可而止。”(《生存的困倦——对一种悲剧思想的剖析》)

1988年10月,我受四川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委托,到深圳参与创办《台港澳报刊参阅文摘》。这是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供县处级以上干部参阅,旨在开阔视野,提高工作水平。1989年3月成都出版社成立,我又回到成都,负责文史编室工作。1993年因《乐兮?忧兮?中国农村潮》出版,我被北京中国公共关系公司聘为总经理高级顾问兼经济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这是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的第二个人生阶段。由于职业变化使我有全面关注社会热点的可能。那时,文学钟鼎般轰鸣之声逐渐远去,代之而起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社会转型大势已定,理论热点从搞不搞市场经济的争鸣到如何搞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由于市场经济已经初露峥嵘,并呈汹涌澎湃之势,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凸现出来,社会价值取向的交锋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展开。农村剩余劳动力蓄势待发的问题、家庭承包责任制下收入增长极限问题、城乡分割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遭受不平等待遇问题、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问题,还有老一代工人的命运问题、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问题、社会信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以及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体制建设与体制完善问题、商品交换活动中的诚信问题等,都与价值取向相关,

令我感触很多。这个阶段的成果最多,剖析“三农”问题(《乐兮?忧兮?中国农村潮》)、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中国邮市忧思录》)、商品交换诚信问题(《洒向人间都是怨》)和社会信仰问题(《练气功者戒:走火入魔》)等四部专著都在这个时期完成。

1993年4月到北京工作使我对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整体推进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我的任务是为公司接下的大型项目和公司自己拟定的项目搞策划,必要时须亲自操作。公司直属中国记协,有庞大的新闻媒体优势。年底,针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份简报的批示——国家经济工作重点是“限产、促销、压库”,我们提出了建立特价商品物资市场的建议,并专程到于光远寓所向于老请教。于老的认真态度令我难忘。他身子略略前倾,非常仔细地听我们对建议的设想和理论阐述,并不时提出疑问。直到一切回答令他满意,他才表示建立特价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后来我把建议整理成文在《人民日报·市场报》上发表。建议很快受到河北省政府和国内贸易部的回应,进入实施程序。我出任特价商品物资开发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着手筹备首届全国特价商品物资交易会。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同志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欣然为交易市场题名。交易会组委会阵容庞大,王光英、程思远任名誉主任委员,柳随年、曾宪梓、于光远、罗圆铮任顾问,时任国内贸易部副部长的何济海同志、时任河北省政府副省长的郭洪歧同志任主任委员。1994年8月,交易会如期举行,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及5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余家客商参加了交易会,上市商品物资(含可供货资源)超过100亿元,成交额达7.2亿元。《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予以追踪报道。

这个项目难以继续推行下去,是我在操作过程中发现的。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以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为前提。要确保这一前提,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客观上使它在转变机制、抢占市场方面与风起云涌的其他所有制经济相比慢半拍。经济转型说穿了是国有企业自身的事。因而中国经济转型是以国有企业失去大量市场为代价的。这个代价直接表现为大量产品积压库房。建议成立特价市场,其目的是用低于正价市场的价格促销国有企业的库存积压产品。然而,国有企业有它特有的管理机制。第一,企业法人不承担产品积压的责任,也没有权力处置国有资产,他不能也不愿意承担因低于市场价和成本价所造成的国有资产变相“流失”的责任;第二,产品积压在库房仍然属于企业的产值和法人的政绩,一旦以低于市场价和成本价销售出去,就明显表现为亏损,对权力负责而不是对企业负责的国企老总,决不会选择这条愚蠢的路。参加交易会的国有企业寥若晨星。要改变这个局势,涉及的领域太繁、“病根”太深了,绝非一日之功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向深层次推进。这个时候,国家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重点,明确提出产权明晰和确保国有资产增殖的要求和目标。我领教了中国经济发展之难,也在另一个层面上体会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何等的来之不易。同时,反省到自己在思考重大问题时存在盲区,那就是对中国社会深层次领域相互掣肘的

关系认识不够——我需要补上这一课。

我真正有一种紧迫感时,已经37岁。时不我待。年底,我到了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作为市委的参谋部门和智囊库,研究室有熟悉全局的优势。它本身就要求工作人员想问题、思对策,要有大局意识、前瞻意识、党性意识;要求工作人员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调查研究,提出有开创性、可行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我在研究室工作近7年没有写一篇理论文章,但一点也不遗憾。思考问题必须着眼于熟悉并体现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必须熟悉并把握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的走向,必须熟悉并顺应市情的发展等等,我在这些方面得到了锻炼,补上了作为理论工作者最重要的一课,为自己之后调到市社科院进入第三个阶段“政治理论创新的思考”奠定了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完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政治体制改革在更深的层面上铺开;政治文明建设庄严地提了出来;执政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上升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及命运的高度。中共十六大胜利召开,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形成,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工作全面铺开。新的目标更加辉煌,新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党员,作为零距离接触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工作者,能不振奋?能不欢欣鼓舞?——因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在理论层面解决了,但还未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才大有可为。

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高水平的增长速度,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但要继续保持这个增长速度,已经到了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相应的政治体制是什么?这取决于执政党对自身的认识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取决于执政党如何建设和国家体制如何建设,故政治体制建设成为理论热点。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十六大报告向全党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指出政治文明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我的理解就是在执政党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三个方面如何贯彻落实“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这一政治纲领。我对政治理论创新的思考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切入的。在执政党建设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这个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课题,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深入理解和广泛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写下《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发表时的正标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全新境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较为正确和较为深刻的理解,其他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必然决定国家建设的走向。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必然服从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走向。至此,由发展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取向问题,在政治体制建设的层面

上得到了明确的回应。

如果说，社会把45岁之前的人视为青年，那么，再过几天，我就彻底告别自己的青年时代了。编辑出版这部文集，算是对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的一次总结、一种纪念。这部文集，呈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感召下，从自发地关心社会发展到自觉地服务于党的事业的心路历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段话，大意是：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其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能够说“已经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就无怨无悔了。30年前读到的这段话，今天想起来，倍感亲切，更受鼓舞。歌德说过：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绿。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时间局限。我不幻想收进这部文集的思考对今天的读者会有多大的启迪，相反，它淘汰得越快，表明社会发展的速度越快。未来的路正长，但愿能够继续保持对社会发展的忠实记录和思考。

2003年2月25日于成都

# 目 录

1 序:见证改革(段 渝)

3 自序:社会转型的零距离接触

## 第1辑

2 人的全面发展与理性的直觉

——现代哲学主题的形成及走向的整体描述

17 自由是独立于必然律之上的人的本质

——对普列汉诺夫必然律自由思想的置疑

23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32 “回到马克思”

——对一个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

38 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

——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思考(一)

40 论自由的人本精神与马克思的自由思想

——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思考(二)

51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思考(三)

63 追问资本的创造力

——对按生产要素和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思考

69 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同样应受到保护

——对资本参与分配的法理思考

74 消除腐败的灰色地带

——从公共权力部门创收看权力的“三化”

79 提高腐败交易成本,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兼谈反腐斗争的长期性

84 公民道德建设与价值理论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取向的再认识

---

第2辑

90 虚拟经济的软着陆走势

——当前中国股市低迷状态下有序波动的理性思考

95 中国库存积压物品的出路

——关于建立全国特价市场的报告

99 “震荡效应”与中国邮市的畸形崛起

——(《中国邮市忧思录》序)

102 中国农业应对入世的着力点

——兼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与中国农业

109 把蜗牛直接捉放在成熟的葡萄上

——就中国农村投资问题与《人民论坛》记者Z谈话录

116 第二生产力:现代管理者

——对农业企业化经营和管理的呼唤